

以想象和形象思维,构造诗歌灵魂

认识学明前先接触了他的“八行诗”,且第一次读他的八行诗就被打动了。记得当时我还跟他开玩笑:你的“八行诗”应该由哪家诗刊专门开“八行诗专栏”,一定会有很多诗人和读者喜欢。后来在外面开会,碰到了学明,他爽朗,为人不拘小节,爱看玩笑,害人之心没有,防人之心也没有。印象最深的是他下巴上的胡子,颇有古人风范和个性。

一位诗人苦心经营文本结构的过程,也是为他的个体记忆和体验赋予一个外在形式的过程。诗歌合集《龚学明的诗》之上册《谁给了我红浆果》,以反问的方式,以名词超越动词的想象空间和动感,勾起我们对沉潜于名词的语言背后的,只有诗人能看见的事物,所引发的好奇与探究。在这些诗中,诗人通过发现,通过形象思维,把无穷无尽的关于我们生存环境的物质和一切存在生物,一一予以赋形,形成一个个伸手可以触摸的鲜明的艺术形象。正如什科洛夫斯基说:艺术就是形象思维,没有形象就没有艺术,特别是没有诗。我在这里想补一句:没有形象思维,也可能没有诗歌灵魂。

“我已发誓不再写花/在这个世界上我的悲观越来越多/但紫红色密集,并不快乐//一种生命消失后/会以什么样的形式再次出现? /在公墓,这些花鲜亮而激烈/它们和地底下的亡灵/不可能没有关联//我代替神在设计生命转换的通路天空蔚蓝,空气洁净/泥土的气息发出邀请/我父亲的痛太重/他在色彩的表达上留下/不想隐藏的痕迹//今天我

给碑上的父亲洗脸/三年前的幼小松柏长大/它轻轻摇晃出熟悉的亲切感/那些紫荆花/松柏,一起延续了全部。”——《紫荆花》

词语直接创造的现场感,让读者情不自禁地生发出在场的幻象。这里语言直指事物和亲人的能力得以显示出来。先入为主的诗人在这里退隐了,让客体不受遮挡地自我出场,同时也让我们直击现场,看“紫荆花”怎样浸染了诗人的情感与思想后,再次意味无穷地和诗人的思念相融合。

诗人喜欢把看到的设为一个角色,就如镜头下的焦点。譬如下面一首《红浆果》。先从外部出发,再逐渐抵达诗人真正想表达的事物内部。先从果实的一个方面、部分和细节滑到另一个方面、部分和细节,并将与果实相关联甚至无关联的形象,进行彼此转换。看似焦点不一,却在秩序内。简洁处大片留白,稠密处亦精描细画,凌厉不失柔和。诗人以镜头从远到近的推拉、闪回,从接近角色,到和角色一起体验和感觉,再到越出自己视线之外,直到完成最后一个鲜明的形象——沉默打坐的人。

“白雪上的红浆果多么美//一个热爱生活的诗人敏感色彩的/象征//弗罗斯特的红浆果让我怦然心动/我想起一个月前我在南京看到的/红浆果鲜艳而饱满/我愿意再看一次(今天我第一次感到风寒刺脸)/我的红浆果还在//为什么要那么悲观呢/银杏和晚樱都放下了矜持/吹落卑微的本色/在荒

杂的琐事中,总有让我们眼前一亮的感动/不要把冬天的风喻为刀戟/所有成熟的走向,在顶端/人生的经验/提炼后的爱,都越来越少/越加醒目,珍贵//一个修炼成佛者/在燃烧后,他的舍利/比俗世的红浆果更重,更耐思/在风中渐枯的红浆果/像一个正放下红色,沉默打坐的人。”——(第二辑《红浆果》之《红浆果》)

“白雪上的红浆果多么美”这根引线拉出,叙事便跟随展开,由视角进行辐射扩散。诗有概述也有细描,同一物在不同视角中在情境之间转移、过渡、混合与交织。语言时态也是多重的,隐喻性的语言,极力于修饰的曲折和复杂变体,情景的设计和递进,是诗人根据已经完成的现行文字而逆向行走的结果。尤其结尾一节,其诗意或诗性绝不止于语言的表面,而是一种立意上的难以言说的事物,它超越语言本身,而有着更深层的寓意。

龚学明的诗集《谁给了我红浆果》,用纯粹的植物而不是花,创造一种宗教,用纯净无边的河流,而不仅仅是水,创造一种宗教。他采用绘画的方式表现,画面或清朗或简约或深远,都源自于原野中的风吹草低,源自于夜晚和白天都涌动不止和流淌不止的河流,源自于陡峭岩壁的延伸,源自于旭日和夕阳以及月光孕育的启发。它们无论是以离散以欢聚以远眺的方式呈现于我们,都是沉默中的岩浆,是他心灵与灵感刹那间的碰撞与闪现。

孙恩

现实与理想博弈中的人性反思

《玫瑰开满了麦子店》是作家石一枫又一部长篇小说,主要讲述的是三个“北漂”青年于生存困境和道德理想角逐中的人性反思。作为地道的北京人,近年来石一枫对于都市北京的变化变化的整体观感逐渐由城市空间转向游荡于城里的人,尤其在小说《玫瑰开满了麦子店》中,作家更以“他者”的眼光来探视世人眼里所谓的“新北京人”,将城市边缘人作为表现新的对象,感受他们所处的生存环境以及精神领地的微妙变化,体会他们在城市打拼灰色的日常,竭力再现边缘人在残缺的社会关系中的种种不堪及遭遇。

小说中以王亚丽为代表的“北漂”生活在极为狭小的空间里,“车声人声、烟味油味破墙而入,充满了这间十平米不到的一楼小北屋。每隔约莫三分钟,最多五分钟,当脚下有列地铁轰鸣而过……磨得过分光滑但又总显得污浊的水泥地面也跟着震颤起来,铸铁窗框嘎嘎作响。”再加上日复一日、毫无自我的上下班日常,成天拖着疲惫的躯体也不曾觉得自己哪一刻属于过北京这座城。王亚丽、岳晓芬、郭立城都是在北京城里奋力打拼的外乡青年,他们经历着家庭或个人的不幸以及不断被生活摧残着,彼此体验着“北漂”的辛酸与不易。深处社会底层的流动的人群,一直面临着生存条件难以保障、缺乏身份认同感、理想与现实的脱节、

各种残缺的社会关系等问题,这些问题往往会使他们陷入“有的时候,脚踏实地的行动比虚无缥缈的幻想还要荒唐”的精神困境当中。现实中的生存境况诱使的更是现代性维度下的现世焦虑和生存反思,生活的微创面虽只涉及个体,但串联起来便指向更为宏大的人类困境。

在创作中,石一枫始终保持着客观和冷静的态度,引领人们走进精神领地去一探生存与道德角逐中的复杂人性。对现实与理想博弈中的“善”的坚守,可以说是为数众多的,犹如王亚丽这般的“玫瑰”带给麦子店的温存与温情。从小缺少亲情呵护的王亚丽,无论亲生父母如何贬低她、压榨她,她也只是以善相对:或而选择隐忍、或而选择逃离。尤其身处异乡的王亚丽,“亲人”二字不仅让她为所谓的男友郭立城倾其所有,还常常陷入在“团聚”里蹭饭、购买特价面包、被追砍人威胁等极度悲苦的艰难处境。她坦言自己精神不够高尚,或隐忍,或自卑,但其日常行为仍表露出善良,即便身体受到伤害,仍靠自己的劳动解决温饱。相比之下,在生存和道德的激烈角逐中的岳晓芬,却“晚节不保”,丢失了她一直以来坚守的精神高地——只因心中还尚存一丝良知,于是她将真相告知于王亚丽。

在长篇小说《玫瑰开满了麦子店》中,作家试

图为漂泊者创造一个看似合理、也可共享的理想空间——“团聚”组织,“团聚”组织无疑成为寻找自我认同感的人们享有的沟通空间,但同样也是揭示人性的载体。岳晓芬虽与王亚丽以“姐妹”相称,却私自挪用别人的钱,岳晓芬示弱、忏悔后得到了王亚丽的谅解。即使王亚丽的善解人意总在母亲、恋人、朋友那里被无情地碾压,但她依旧对生活充满善意。至于物质层面上的桎梏我们理清了其潜在的道德危机:郭立城挪用了客户的押金以及入室抢劫都难逃法律制裁,岳晓芬挪用郭立城的“启动资金”违背自己的道德标准难逃心灵谴责。在生存与金钱的面前,他们俩显得尤为卑微和自私,同时让我们洞悉这个物欲纵横的时代下青年人缺失的阵地,向人的灵魂深处的叩问。

学者孟繁华就曾指出,“作家记录时代生活,同时也必须表达他对这个时代生活的情感和立场,并且有责任用文学的方式面对和回答这个时代的精神难题,特别是青年的精神难题。”换言之,石一枫通过对《玫瑰开满了麦子店》中王亚丽、岳晓芬、郭立城三人坚守中有所舍弃的现实生活、精神困境的细致刻画,再现出时下年轻人在理想和道德面前的彷徨和挣扎。石一枫以犀利的目光关注了更为“真实”的漂泊者的心理历程,正是他与时代、与他者对话的深刻表现。

张凡 袁亚冰

挡不住的女子力

“女子力”一词,获得了日本2009年度热词提名。从字面意义看,女子力指女子的能力。但引申出来,却是指女子的生活态度。

《五十岁,我辞职了》,是日本“女子力”系列丛书之一。在书中,作者稻垣惠美子讲述了,为何要在五十岁辞职,在辞职之后,过上了什么样的生活。正如作家毛丹青在丛书序言里所说:“这本书详细地描述了她对日本现代社会的选择,其文化着眼点是广泛的,很生活,很理想,同时也是很励志。”

在日本,稻垣惠美子是位家喻户晓的女性。究其原因,并非由于她是原《朝日新闻》编辑委员,而是因为她在四十五岁时,烫了款非洲爆炸头。先是这种发型,令她意外走红。然后,导致她五十岁从大公司辞职。最终,她说过了没钱也能很快乐的生活。通过本书,稻垣惠美子竟然把这种完全不靠谱的逻辑关系说明白了!真不枉为日本新闻界精英。

烫个爆炸头,肯定是偶然为之。但要去尝试一次自己从来没做过的想法,却在稻垣惠美子心里积攒了很久。为啥要这么决绝地突破自己?前情提要便是稻垣惠美子的工作压力,让她透不过气。

日本职场压力之大,排世界前几名,尤其对于职业女性来说,颇不友好。绝大部分日本女性,在

结婚之后,便主动辞职,回家相夫教子,做家务。少数像稻垣惠美子这样的,单身无子,一直坚守在职场,往往能够做到比较高的职位,收到一笔不错的退休金。日本退休金分两部分,一部分像中国的养老金,按月发放。另一部分有点像荣休金,由企业一次性发放,这部分金额相当可观。而且,荣休金按连续工龄计算,工龄越长退休时拿到的越多,大公司尤其多。

因此,对于稻垣惠美子一毕业就进入朝日新闻社工作,工龄二十多年,单身无子的女性来说,提出裸辞,的确需要很大的勇气。当然,这与在职期间,她立志重建《朝日新闻》品牌不无关系。就是在那个时候,她烫了爆炸头。五十岁时,她在公司工作忍无可忍:“在公司工作,说得极端一点,也就是人生被金钱所支配。”你瞧,她已经厌恶到否定在公司里工作的价值了。稻垣惠美子说,比起“金钱”,现在更想要“时间”或者“自由”。她拒绝的不是工作,而是公司。烫个爆炸头只是发泄的裂缝,辞职才是出口。书中充满了她对日本这个“公司型社会”的鄙视。她在本书序言里写道:“如果本书能让你对‘在公司工作’进行重新思考的话,我就倍感欣慰了。”稻垣惠美子,就是个恨公司的人。

稻垣惠美子的人生选择,自然不是任谁都能效仿的。但她至少是一个表率,说明了一种可能

性,原来女性也可以这样生活。稻垣惠美子在辞职之后,对自己实行了改造计划,令人忍不住又气又笑。她为自己每天的零花钱设了上限,自嘲说,与其说是“快乐”,不如说变成了“忍耐”。她在奔向“没钱也能快乐”的路上,像个披荆斩棘的女斗士,充满了对自己狠一点再狠一点的人生经验。不过,她是天生的乐天派,乐趣无处不在。比如每到休息日,必定光顾各地的直销点,还能在买菜的郊县进行山中漫步,最后在山里的朝圣者身上读懂了“什么才是幸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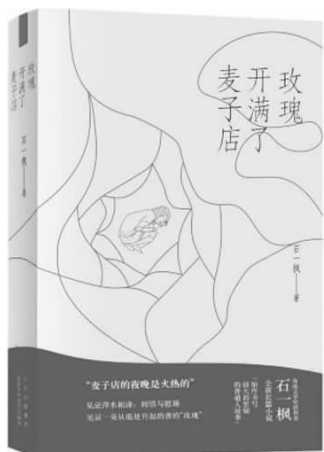
在中国,女性五十岁退休很正常。但在日本,随着长寿社会的到来,很多人把退休后,当成第二人生。于是,稻垣惠美子将“五十岁能辞职”当作自己的一个重要规划,她觉得人生应该有一段“林栖期”,也就是离开家庭,远离世俗,隐居到一无所有的山林。但如果她想过这种生活,一定得离开对于单位(大公司)的依赖。她在本书接近尾声时写道:“是的,公司是修行的场所,而不是可以依赖之处。”这倒是给我们这些年轻人提了醒:总有一天,修行结束,我们就可以从公司毕业了。不管那一天,我们是三十岁,还是五十岁,不重要。

与十八岁离家,二十五岁离开学校相比,五十岁离开公司,也是一种独立啊,在稻垣惠美子身上,我看到了挡不住的女子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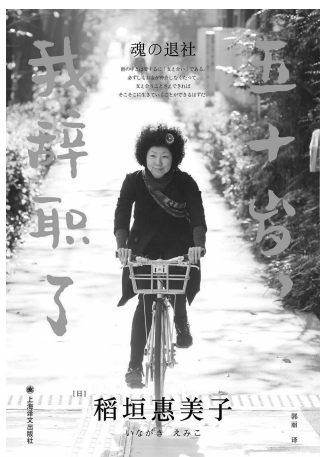
夏丽村



《龚学明的诗》
龚学明
南京出版社
2020年10月



《玫瑰开满了麦子店》
石一枫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20年10月



《五十岁,我辞职了》
[日]稻垣惠美子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20年10月